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 (1992—1993)

新的突破 与新的挑战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1992—1993)

新的突破与新的挑战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

(京) 新登字 0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的突破与新的挑战 /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著.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

ISBN 7-5005-2507-9

I . 新… II . 中… III . 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研究 IV .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2039 号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1992—1993)

新的突破与新的挑战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 15 印张 370 000 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定价: 20.00 元

序

在过去的 15 年中，当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大分化、大动荡、大重组的历史时期，中国却在经历着由中国共产党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自下而上的渐进式革命——成功地推进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与此同时，创造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种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能同时取得并行不悖的巨大成就的实例，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实不多见。

由此，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与积极评价，人们逐渐开始重视研究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

回顾 15 年来发生在中国的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度，发出改革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号召。这一历史性决定代表了举国上下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愿望，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因而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此后的改革实践一再表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许许多多的新事物都是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人民群众的改革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改革的基本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得以使这场涉及全方位的经济变革逐步推向深入。当然，这样一场复杂的经济变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因此，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不尽一致，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思想混乱和消极现象。为此，1992 年初，小平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作了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再一次明确了判断改革开放基本方向的三条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重申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良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通观小平同志的谈话要点，其核心仍然是坚持了八个大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发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讲话到党的十四大召开，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这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短短两年来，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发展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体制改革不仅涉及对旧体制的改革，而且还包括了新体制的培育；发展经济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扎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的发展。客观地讲，1992—1993 年两年来，我们在改革与发展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个阶段。显然，改革与发展向纵深推进了，经济关系更为复杂，新旧体制矛

盾更加突出，我们的任务也愈加艰巨。这是很正常的，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正是在不断地解决困难、克服矛盾中稳步推进的。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资助的一项研究成果。我们聘请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认真总结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中成功的经验，分析、论证这一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把前进中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进行深入研究。本期报告——新的改革与新的挑战，作为第一本，主要涉及1992—1993年的内容，此后将逐年推出年度或阶段性报告；此前的《报告(1978—1991)》在今后适时补齐。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讲困难是为了克服困难，讲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旧的困难、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困难、问题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此既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理论准备，又要树立必胜的信心。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面对挑战，知难而进，最终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目 录

导 论 1992—1993：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	1
1. 1992年以前的历史进程	1
2. 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与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3
3. 新阶段上的新问题	4
4. 深化改革的紧迫性	8
5. 新阶段战略与对策的思考	12
6. 近期的展望	16
第1章 50%的突破：非国有经济的新发展与产权改革的新要求	18
1. 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18
2. 国有经济“放权让利”改革的局限性	28
3. 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与产权关系改革	33
第2章 农村改革的新支点：股份合作制	38
1. 当前的农村经济改革	38
2. 股份合作制的兴起及其主要形式	41
3.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产生的重要意义	48
第3章 价格改革：成功的经验与教训	53
1. 1989年以来价格改革的新突破	53
2. 价格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	57
3. 深化价格改革的对策	62
第4章 证券市场与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	65
1. 概述	65
2. 1993：高度货币化基础上的证券市场	67
3. 资产结构变动与经济成长	72
4. 趋势与对策	75
第5章 初步发展的房地产市场	77
1.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进程	77
2. 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	81
3. 房地产业发展的对策分析	84
第6章 加快发展开放型的市场经济	92

1. 改革进口体制与市场准入	93
2. 知识产权保护：进展与意义	94
3. 外商直接投资：进展与问题	97
4. 人民币走向可兑换	101
第7章 从“混乱”中突破：经济市场化对金融体制的挑战	110
1. 混乱的同业拆借市场与规模控制的有效性	110
2. 社会集资热与利率市场化	113
3. 人民银行分行再贷款权的收与放	115
4. 中国的“白条子”和“绿条子”	117
5. 经济市场化与金融机构热	120
第8章 秩序紊乱和体制矛盾：财税改革迫在眉睫	124
1. 财政预算收入的滞后增长	124
2. 政府收支活动的边界问题	131
3. 财税体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	135
4.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138
第9章 总量矛盾与结构问题：宏观管理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	143
1. 1992—1993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征	143
2. 需要澄清的认识和判断	144
3.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148
4. 现阶段宏观管理的体制基础	151
5. 近期宏观管理的方针和措施	153
第10章 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中潜在的危机	155
1. 引言	155
2. 危机：收入差距拉大	156
3. 成因：多重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	162
4. 对策：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市场体系	163
5. 政府作用：强化公共品供给	165
附录1 1992—1993年改革与发展大事记	168
附录2 主要国民经济统计指标	189
后记	233



导论 1992—1993： 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们从其身边的点滴变化中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每一次改革开放的深化，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城市经济有了新的活力，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整体经济迅速发展；……总之，改革开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 1992 年以前的历史进程

1992 年以前，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趋势：

- 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正在被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结构所代替；
- 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旧经济运行格局正在被以市场信号为主的新格局所代替；
- 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体制正在被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体制所代替；
- 单一的财政建设资金渠道正在被财政、金融、自筹和利用外资的多元化渠道所代替；
- 封闭型的经济正在被开放型经济所代替；
- 单一的行政性直接宏观经济调控正在被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间接宏观经济调控所代替；
- ……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

- 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到 1987 年国内生产总值提前实现了比 1980 年翻一番的目标，198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 1000 元，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改革前累计的总和；
- 社会财力有了较大增长。1979—1988 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均递增 8.7%，高于

1953—1978 年年均递增 7.2% 的速度，预算外资金改革以来年均递增 20.7%，高于改革前递增 15.1% 的速度；

——对外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以及内地的多层次的开放格局，进出口总额由 1978 年的 206 亿美元上升到 1988 年的 1028 亿美元，年均递增 17.4%，高于改革前递增 9.5% 的速度；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 1979—1988 年平均每年增长率分别为 6.5% 和 11.8%，高于 1953—1978 年的 1.6% 和 2.6% 的水平。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由 2.2% 提高到 7.6%，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率由 13.1% 提高到 33.5%，住房、医疗等条件也明显改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数居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这表明，1979—1988 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开创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最旺盛、国力增强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对外开放取得最大进展的新时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冷静地看到由于一度存在的急于求成，对改革的复杂性和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通货膨胀危害性认识不足，加上宏观调控出现了一些偏差，以至出现了影响经济全局和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社会需求增长过快，供求总量失衡的矛盾加剧；加工工业发展过快，使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金融形势出现危机，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明显超出经济正常发展需要；市场物价涨幅过大，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抢购风、挤兑风一度甚烈；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混乱，“官倒”腐败现象突出。由此引发了 1988 年剧烈的通货膨胀危机，社会和经济不稳定一度表现十分突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和政府采取了“治理整顿”的特殊措施，即“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方针应运而生。从 1988 年第四季度开始到 1991 年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暂时的平稳发展期。三年的治理整顿，使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供求失衡格局有了改变，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市场供应充足，消费平稳增长，秩序明显好转，基础产业得到加强，“瓶颈”矛盾有所缓解，进出口由逆差转为顺差，外汇储备明显回升，人民生活继续改善，改革也取得一些新进展。应该说，从总体上讲，治理整顿取得了预期成效。但是也应看到在经济形势趋于短期稳定的同时，一些影响经济长期稳定的深层次因素并未根本消除，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存量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还比较突出。特别是一度在社会上出现了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怀疑倾向，对已确定的改革方向产生了动摇。加上国际风云变幻，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施压和经济制裁的措施，周边各国抓紧发展的现实，使中国的发展面临了巨大的外部压力。

内有困难，外有压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是用新眼光看待问题和矛盾，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坚持改革开放，重振经济发展？还是用老眼光看待前进中遇到的挫折，退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重新搞行政性指令推动经济发展？人们正以焦急的眼光注视着、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的抉择。

2. 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与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说最需要说的话”。正当人们彷徨困惑之际，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其卓越的政治家的气魄和胆略，洞察历史、把握未来，迈出了他的南方视察步伐，发表了震动世界、激发中国社会内在活力的重要谈话：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雄壮的动员令，犹如“一股和煦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使各方面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小平同志的南方视察讲话，重新激发了人们改革开放的热情，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值桎梏，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三个有利于”标准，使人们开始摆脱凡事问“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生产力标准上，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高潮的掀起。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贯穿了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精神，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建议政府修改原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求将原定的国民经济增长6%的目标，提高到递增8—9%，力争国民经济隔几年再上新台阶。党的十四大进一步统一了各方面的认识，对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加快改革开放的积极性起着重大作用，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小平同志的南方视察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经历了十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力争在本世纪内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使国民经济提前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新的框架和新的目标，激发了新的活力，中国再次向世界展示了新的姿态。

——国民经济由“慢车道”步入“快车道”，强劲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形成鲜明的对照。199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403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其中工业增长率超过20%；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其中工业增长率仍达到20%左右。钢、发电量、原油、原煤、粮、油、肉、水产品等主要产品产量再上新的台阶。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投资率连续两年超出30%，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增加，特别是交通邮电投资成倍增长，所占比重达1/5左右，京九铁路等主要干线建设进展迅速，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连续超过1000万千瓦。国内市场更加繁荣，商品零售总额突破1万亿元，市场供应充裕，消费选择余地扩大，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档次上升。国民经济连续两年13%的高增长，为世界所瞩目，国际舆论发出惊呼：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中心！

——对外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前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1992年，中国政府作出了新的开放决策：新开放了沿长江的城市5个，内陆省会城市18个，沿边境城市13个，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保税区、新技术开发区不断出现。外商来华投资热情高涨，当年新批准利用外资协议达到48858项，超过了1979—1991年累计42685项的水平，协议金额达69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92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达113亿美元，首次超过对外借款水平。1993

年，外商来华投资热情不减，上半年即已超出上年全年的水平，到年底新签协议近 10 万项，比上年成倍增加，协议金额超出 1000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350 亿美元左右，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250 亿美元左右，比上年又有成倍增加。利用外资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大企业、大财团来华投资增多，中长期投资增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增多，外商投资领域更加广阔，结构向优化方向转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1992 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165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2.1%，其中进口和出口均超过 800 亿美元。1993 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195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8.2%，其中出口超过 900 亿美元，进口超过 1000 亿美元，再上一个新的水平。

——改革又有新的突破，新的改革高潮正在不断向前发展。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步伐加快，价格改革连迈大步，证券市场重新活跃，股份制改革试点更加广泛，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等也更加活跃，整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政府转变职能开始起步，其他改革也逐步推开。特别是 1993 年，在改革方面出现了新的形势，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筑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各方面在许多重大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形成了更广泛的共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为重点，大力培育市场体系，配套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所必需的改革正在陆续实施。目前 90% 左右的市县已放开了粮食购销价，多数城镇居民告别了粮票、粮本——这一计划经济最后的产物。所有制改革更加大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1992 年首次与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平分秋色，1993 年非国有经济比重已超出国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宏观调控在更加有效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方面作了新的探索，取得了新的经验。尤为可喜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大的更新，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正在不断提高，“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对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无疑是重要的。新一轮改革正在由破转立，由单项转综合，由浅层转深层。可以预见，尽管改革难度大，风险大，但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尽管目前的改革所取得的进展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毕竟是在新的浪潮中滚动！

3. 新阶段上的新问题

1992—1993 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独步世界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迈向了新的台阶。伴随着这种高速的经济发展，改革过程中一些旧的、没有充分解决的问题又突现出来，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更增添了其复杂性，从而使在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徘徊停滞的各方面改革又重新复苏，一些原本在未来方能进入议事日程的改革事项已被迫提到议事日程。因此，1992—1993 年，特别是 1993 年，成为各种新旧问题表现得十分充分的年份，其展现出的各种问题也越发引人瞩目，中央不得不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

3.1 经济发展出现局部过热现象

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出现起伏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但 1993 年中国经济的起伏却是十分独特的。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新经济因素大量出现，而深层次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新旧体制互相摩擦、碰撞，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使上半年整个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现象。

1992—1993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伏表现在工业生产的波动特别明显。回顾一下工业生产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1992 年的工业生产在 1 月份还仅仅以 12.9% 的速度增长，但在 2 月份，随着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的公布，猛增至 22%。1992 年全年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 21.7%。使 1992 年的工业生产超过 1985 年（增长 21.4%）和 1988 年（增长 20.8%），成为自 1980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见附录 2，表 1）。到 1993 年，除了 1 月份受元旦、春节两个大节日影响，只增长 9.8% 外，2 至 8 月工业生产都以 20% 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但随着中央 6 号文件的下达，十六条调控措施的出台，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开始回落。1992—1993 年的工业生产呈现出自 1992 年 2 月份起逐月加快，以 1993 年 6 月份增长 30.2% 为转折点，连续四个月下降之后，在 11 月份又略有回升，12 月又有大的反弹的波动态式（见附录 2，表 2）。

分析其波动原因，从表面看，1993 年中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似乎是产生波动的直接动因，但从深层看，经济发展出现起伏还是由于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造成的。为了不使过高的增长速度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从而造成整个经济出现大起大落，方才开始了宏观经济的调控。

3.2 金融秩序混乱

伴随着 1992 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资金的短缺越来越严重。发展到 1993 年上半年，全国普遍发生了乱拆借、乱集资、挤占重点建设和农产品收购资金等现象，金融秩序出现了混乱，致使 1993 年上半年银行储蓄存款大幅度下降，货币投放水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专业银行存款支付能力下降，物价水平连续上涨，重点建设资金被分散，资金到位率很低，农产品收购打白条，部分地区出现绿条现象，整个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宏观环境十分紧张。

金融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体制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旧的金融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这种弊漏主要表现在：随着单一的金融组织体系被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所代替，新的金融管理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僵化的利率机制不仅不能反映资金市场资金的供求变化，而且使中央银行无法灵活运用利率进行宏观调控；在国有企业制度和财政制度不合理的制约条件下，银行成为失衡财政与亏损国有企业的调节器，形成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障碍。

因此，1993 年年中开始了全面金融秩序整顿。伴随着调高利率、清收违章拆借资金、稳定汇率、严肃金融纪律等控制投资投向的措施的出台，金融秩序出现了好转。第三季度，城乡居民存款增加 1077 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加 666 亿元；乱拆借的约 1000 亿资金也基本收回；现金投放势头有所扭转，7 至 9 月银行现金投放比去年同期少 192 亿元；专业银行支付能力增强，9 月底专业银行存款备付金率升达 7.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自 7 月开始

一直稳定在 1:8.8 左右这一基本合理的水平上；秋季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业已提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也有了保障，1—9 月份，建设银行对铁路、煤炭、石油、电力、交通、钢铁、化工、石化、建材等九个行业的重点建设增加贷款 220 亿元，全年资金到位率达 82.8%，超过了国家有关部门规定资金到位率达 70% 的要求。随着金融秩序的恢复，宏观经济的调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3 年金融秩序的混乱也成为一种宝贵的教训，使金融体制的改革列入了议事日程。

3.3 固定资产投资过猛

1992—1993 年，与高速的经济发展相应，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又呈现出超常规的高速增长态势。1992 年，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8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2.6%，其中中国有单位投资 52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4%，集体单位投资 13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7%，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峰。1993 年，在国民经济进入超高速增长之后，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又呈现出超常规的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542.2 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61%，其中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0.7%，全民商品房投资增长 143.5%，明显显示出投资失控的状态。尽管下半年采取了控制措施，但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达到 118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 左右。

与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相伴随，是全国性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与“股票热”。全国注册房地产公司急骤增加至 3 万余家，各地普遍兴起了“圈地热”，全国规划占地达 1.5 万平方公里，各级开发区达 8700 个，但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只有 119 个。与之相对应，全国股市在经历了 1992 年的暴涨暴跌以及深圳股市风波之后，1993 年取得了高速的发展。由于 1993 年是把股票市场试点扩大到全国的第一年，该年形成了全国性的“股票热”。其表现在：第一，上市公司数量增多。截止到 11 月份，上海、深圳上市股票为：A 股 152 家，B 股 36 家；第二，两个交易所的会员，特别是异地会员迅速增加。截止到 9 月底，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共 797 家，其中异地会员 707 家，占总数的 88.7%，表明深、沪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已成为全国性的交易所；第三，股票交易总成交额成倍增长，截止 9 月底，深、沪两地交易总额为 2360.2 亿元，其中 A 股为 2236.99 亿元，B 股为 86.72；预计全年将突破 3 千亿元。

于是，房地产、开发区与股票成为 1992—1993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热点。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从而使其成为导致 1993 年上半年经济过热的动力源之一。尽管房地产业、开发区与股票市场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无疑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 1992—1993 年兴起的“三热”却使我国的经济走入了误区，其谬误之处在于“房地产热”与“开发区热”其实仅仅热在“地”上，“股票热”也仅仅是热衷于淘金，其目的是通过“炒买炒卖”快速增值。1992 年，据初步统计有 570 亿的巨额资金通过银行拆借到沿海地区，几乎全投入到炒地皮等项目上，而实际真正开发建设的地仅为圈地面积的 2% 左右，即 307 平方公里。另据建设部统计，1992 年有实际开发业绩的房地产公司仅有 7066 家，实有资本总额 408 亿元，而如果现有 3 万余家房地产公司全部进入开发，则需资本 2000 亿元左右。1992 年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在结构上不合理，并且许多是着眼于炒卖地皮的投机行为。而开发区的设立也出现了很大的盲目性，许多开发区只是圈了一块地，并没有真正的开

发项目。据有关部门测算，若将“生地”变成“熟地”，每平方公里基础设施要投资 1.5—2 亿元，建成总耗资 20 亿元，以此推算，全国开发区如果全部开发，投资规模将达 30 000 亿元左右，全部建成至少需要 40 多年！

因此，1992—1993 年过猛的固定资产投资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方向上都显示出不合理性，既无助于结构的调整，也无助于效益的提高。并且，盲目地建开发区、搞房地产所带来的教训，也表明投资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

3.4 农民负担问题突出

1992—1993 年，与农产品收购打白条问题相对应的，是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1992 年，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司对全国的农情进行普查，粗略统计 1991 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不情愿支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达 17.7 亿元，各种罚款达 23.1 亿元，集资摊派达 41 亿元，其他社会负担达 38.1 亿元。上述各项合计 119.9 亿元，全国农民人均 13.8 元，占 1991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2.5%。于是，国务院责成农业部、监察部组成强有力的农村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已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首要问题，过重的农民负担不仅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危及整个经济的基础——农业。

1992 年，江泽民亲自主持召开了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与此同时，李鹏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1993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6 月国务院宣布了第一批取消的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 37 个集资基金和收费项目。减轻农民负担成为 1993 年新闻媒介的热点话题，全国 3 000 余名乡镇以上干部因农民负担问题受到处分，减轻农民负担已被列为稳定中国经济的战略性举措。

3.5 通货膨胀加剧

1992—1993 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全国性的较高的通货膨胀。集中反映在从 1992 年四季度开始的物价连续上扬这一物价变动过程中。从变化趋势看，1992 年一至三季度，物价上升的趋势一直是比较平缓的，一季度上涨 5%，二季度上涨 4.8%，三季度上涨 4.9%。但从四季度开始，物价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阶段。零售物价连续攀升，1992 年 10 至 12 月同比指数涨幅分别为 6.4%、6.6% 和 6.8%。进入 1993 年，涨幅进一步增大。1 至 8 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 8.5%、8.7%、9.1%、10.9%、12.5%、13.9%、14.9% 和 15.1%，平均涨幅约为 11.8%，预计全年比上年上升 13% 左右。其中全国大中城市的物价上涨更为严重。全国大中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上涨 19.6%，为近些年价格涨幅高峰。食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18.1%；穿用等工业消费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13.6%；服务项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39.3%。另外，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也很大。1993 年三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5.8%；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40.6%；生产资料出厂价格较去年同季上涨 35.4%。

1992—1993 年通货膨胀加剧的原因有正常的价格调整因素，但主要因需求拉动，成本推进上升所致。尽管 1992 年国家调价因素占零售物价指数 5.4% 的 3 / 4；1993 年调价因素

亦不低于 30%，但引起 1993 年物价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因素，还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膨胀。它一方面造成了能源、原材料、交通等的全面紧张，供求矛盾突出，价格上涨；一方面也导致了消费基金的快速增长，增大了对物价的冲击力。其结果是，过高的物价总水平对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

3.6 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

1992 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还是良好的，到了 1993 年，由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国内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致使进口的增长大大快于出口的增长，商品贸易出现了较大的逆差。加之世界经济持续萎靡不振，抑制了出口的增长，使 1993 年国际收支出现了不平衡。据海关统计，1993 年出口 918 亿美元，增长 8%，进口 1 040 亿美元，增长 29%，贸易逆差 122 亿美元，加上近几年外资大量涌入，我国现在又处于还债高峰，1993 年出现国际收支大的不平衡已成定局。

随着外贸形势的这种变化，1992—1993 年人民币汇率剧烈起伏。自 1992 年四季度起，外汇调剂市场美元与人民币汇价不断攀升。进入 1993 年，这种攀升的势头不断增强，在北京全国外汇调剂中心，美元对人民币的比价曾达 1:10.7 的最高比价，黑市交易也很活跃。这种人民币汇率急剧下降的势头至 7 月份方随整顿金融秩序措施的出台得到平抑，自 7 月份起人民币汇率才稳定在 1:8.8 左右。但人民币贬值使外贸部门面临供货企业提价和外商压价的双重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剧烈起伏成为影响 1993 年出口增长，进而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

1993 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一方面受世界经济以及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因我们外贸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不适应发展的需要造成的。因此，外贸体制改革与外汇管理体制的变革已成为保证来年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必须加以完善与改进。

4. 深化改革的紧迫性

1992—1993 年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从改革与发展的角度进行概括的话，无疑将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的问题，一类是发展的需要与旧的经济结构相矛盾引发的问题。前一类问题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复性，在旧的经济体制没有彻底改造之前，这些问题将会一再出现。而后一类问题，则会随着中国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必须以新的方法加以解决。纵观 1992—1993 年的改革与发展中，经济发展出现局部过热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失控，金融秩序混乱，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无疑是深层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的因素，而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国际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虽然不能完全抛却旧体制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992—1993 年的宏观经济运行表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改革与发展不适应。这种不适应表现为：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后，发展走在了改革的前面。这对受计划经济影响最大的国有经济特别明显。回顾

15年来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发展每向前迈进一大步，改革则向深层目标迈进一步；而改革每向深层目标迈进一大步，发展则向前迈进巨大的一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起步，经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纲领，每一次在改革方面的重大突破都是由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引发的，而每次改革方面的重大突破又带来巨大的社会发展。由此，现阶段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可以说已形成了改革与发展互动的双向循环，显示出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改革的趋势。

4.1 深化改革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当中，旧体制并没有加以完全的改造，因而，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新旧体制互相摩擦的巨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可以说仍未摆脱“放—收—再放—再收”的经济循环。每当宏观经济环境好转，就会伴随着经济扩张期的来临，出现工业生产高速增长，投资猛增，银根放松，能源、交通、生产资料紧张的现象。而每当这种经济扩张超过了旧体制所能容纳的限度，又首先表现为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以宏观调控为特征的经济收缩时期的到来。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长与收缩的自然周期，而取决于旧体制的容纳限度，致使建立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屡屡为这种周期性的收缩所打断。在以收紧银根为先导，以全面的平抑增长速度为特征的紧缩中，各项改革因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而延迟。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并未随“放—收”的周期得到解决，整个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效益逐年递减，经济发展主要靠增加投资加以驱动。

进入90年代，这种状况有所好转。1993年的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宏观经济调控表明，宏观经济的波动与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相比已大不相同。1993年当年就有效地控制了经济波动。这表明过去整个经济出现大起大落，波动周期很长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在中国经济未完全进入世界经济循环，受世界经济影响不大的条件下，快速增长下的短波动周期、小波动幅度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这一方面表明我们宏观经济调控的水平在提高，操作更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通过前一段时期的改革，市场经济已发挥作用，宏观经济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已开始遵循市场规律。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改革开放的加速和非国有经济的飞速发展。由于非国有经济处于传统的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控制的边缘地带，并且作为整个经济改革的试验区域，相对国有经济，不仅享有许多政策允许下的自由度，而且在制度、经营、用工等各方面具有灵活性，因而，这种“收—放”周期对之的影响相对为轻。由于非国有经济现在已占有 $1/2$ 的份额，因此，非国有经济的自由度与灵活性使新旧混合的经济体制具有了弹性。尽管国有企业分布在整个经济的骨干行业，仍旧主宰着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但整个经济的发展因这种弹性的存在，已经开始摆脱“收—放—再收—再放”的恶性循环了。

4.2 深化改革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但是，在这种摆脱“收—放”周期恶性循环的过渡期中，也会因存在着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甚至体制真空而引发许多问题。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仍然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且投资体制的僵化使投资的效率低下，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不合理，对投资的控制因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只能进行总量控制，极难从结构与方向上加以调整。所以在现阶段，投资可以说是影响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

有关这一点，可以从影响 GNP 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投资、消费、对外贸易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联中看得很明白。1990 年，GNP 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为 5.99 : 1，而 1992 年则下降到 3.29 : 1；与之相对，GNP 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之比 1980 年为 2.09 : 1，1992 年则为 2.18 : 1，十分稳定；而进口总额与 GNP 之比 1980 年为 0.067 : 1，1992 年为 0.192 : 1；出口总额与 GNP 之比 1980 年为 0.061 : 1，1992 年为 0.202 : 1，增长虽快但无足轻重(见附录 2，表 3)。这表明在影响 GNP 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中，因消费对 GNP 的贡献相对恒定，对外贸易对 GNP 的影响甚小，GNP 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加以拉动。但因投资效率日益下降，1980 年 1 元的投资可支撑 5.99 元的 GNP 增长，1992 年 1 元的投资则只能支撑 3.29 元的 GNP 的增长。也就是说，要维持同样的 GNP 增长率，90 年代需要比 80 年代多几乎一倍的固定资产投资。

这可以说是剖析现阶段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所在，以此来分析 1992—1993 年、特别是 1993 年的经济发展，将会得出清晰的认识。1992—1993 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好转，GNP 的高增长率成为普遍的预期目标。在固定资产投资对 GNP 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也就必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1992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2.6%，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峰年；1993 年上半年更是以 61% 的增长率攀上了极峰。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必然要以超越常规的手段方能实现。由于国家财政日益捉襟见肘，私人投资渠道不畅，最终必将以“两头紧挤中间”的形式出现。因而，它一方面要以银根的宽松为前提，一方面又要以体制上的弊漏为依托，通过不正常的银行拆借、社会集资、挤占农产品收购款等其他筹资方式，甚至强行摊派以达实现，从而必将超越国家的控制范围，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最后大量的资金流向“增值”最快的领域——房地产、开发区、股票，引发了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伴随着较大范围的物价改革，通货膨胀加剧；因国内需求的旺盛，致使进出口形势发生逆转，国际收支出现了不平衡。最终导致经济增长越过了能够承受的阀值，新旧体制摩擦加剧，被迫进行全面的宏观经济调控。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以旧经济体制的弊漏为依托，以新体制不完善为根源的。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又因新旧体制相互摩擦，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1992—1993 年经济发展的局部过热现象表明，长此以往，将既无助于增强国家实力，又无助于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只能成为推进改革事业发展的重大隐患。